

“背影”系列是马未都为故去亲友所作。书中人物身份各异、亲疏有别，都在作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回忆与友人“遇见”的时光，记录他们真挚的性灵，见证时代与人风云际会的珍贵片段。

接到冯天有叔叔辞世的噩耗时，我的思维停顿了许多，木木地呆坐着，极力回忆与他最后一次见面的时间，至少有三四年了，五年也不一定。我回家看老妈，冯叔叔与老伴董阿姨一起院中散步，见我笑容可掬地“未都未都”地称呼，眼中全是我熟悉的怜惜之情。其实我们相识的那年我已20岁了，冯叔叔33，有一对五岁双胞胎儿子，想想40年一晃就过去了。

近邻不如对门

我们两家对门，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冯叔叔调来空军总医院就因正骨绝技受到周总理的重视。

按说，冯叔叔施展医术我是看不到的，都是听说如何神奇，但事有凑巧。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大地震发生。那一刻，我们两家都住在五楼上，楼房剧烈变形，导致门框挤压门打不开。当楼房停止晃动归位时，对门和我家的门同时打开，只见董阿姨左右腋下各夹着一个孩子，那时老大老二只有五六岁，仍在半睡状态。



马未都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所有人都奔向楼下，当时我和弟弟试图从董阿姨手中接过一个孩子，董阿姨没有工夫给，直到下到三楼，我弟弟才从她手中接过其中一个，跑到楼下门外时，我弟弟悄悄地对我说：“母爱的力量真大。”

医生是有职业敏感的，冯天有大夫说：“我得先去办公室，伤者会大幅度增加。”说完就走了，董阿姨带着老大老二和我们在一起。我爹那会儿已经不在职了，无事可做，和我们待在一起，说：“这事一时半会儿完不了，空军动作快，估计今天会有伤员运到。”

果不其然，上午大概八点多钟，救护车就呼啸而至。空军的军用飞机从唐山机场起飞，抵达北京西郊军用机场，西郊机场离空军总医院很近，伤员下了飞机就拉了过来。那时的空军总医院内特别宽敞，空地很多，灯光篮球场好几座。由于安全考虑，楼房都不能进入，篮球场就成为了临时救护

《背影2》选载之一

对门冯天有

所。领导一声令下，篮球场立刻用水冲去尘土，用白布围起一个一个小区域，伤员就在带轮担架床上抢救，气氛如同战时。

7月28日，大家都在院子里熬了一夜。第二天，大人们就开始想办法了。于是一个新事物新名称就出现了——抗震棚，用最简陋的材料，盖最实用的居所。我爹把冯天有大夫拉至一边说：“你和小董肯定都忙，孩子又小，抗震棚就和我们一起来将就吧！”冯大夫还推托了一下，爹说：“你们救死扶伤，忙你们的去吧！”随后就指挥我们哥俩，开挖了一个大约3×5米的大坑，大概用了两三天时间，抗震棚有模有样地竖起来了。

到家门口的伤病人

冯叔叔是天津人，说话老带出天津音，我听着有点眼，有时我们聊着聊着冯叔叔就有活了，各类病人慕名而来。凡是到家门口的伤病人，冯大夫都一副平和安稳的态度治病。

一天，一群人连背带扶一个中年妇女到抗震棚来。她屁股歪到一侧，冯大夫喊了一声：“找一把椅子来！”随即让人把患者放到椅子上，背冲自己，用手按了按脊椎腰椎，说了句“错



位”，然后让旁人帮忙摁住患者，以一种拧麻花似的手法，龙行蛇走般一拧，只听不大的“咔嚓”一声，冯大夫再用手摁了摁，说：“好了，休息一会儿就能走路了。”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过了几分钟，那个胖胖的中年妇女在人搀扶下竟然站了起来，慢慢地试着走了几步，眼含泪水地对冯大夫说：“恩人，救命恩人哪！”冯大夫摆了摆手说：“回家后要小心，千万别再用力了。”一群人千恩万谢地走了，没有任何费用，也没有送礼，甚至都没有人知道病患是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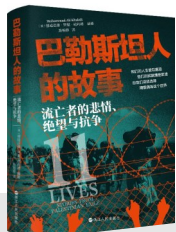
给金日成看腰痛

冯天有1966年由第四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在空军做航空军医。他看到许多飞行员因骨科伤痛常常停飞，心里多有惋惜。偶然间，他听说北京东郊双

桥有位姓罗的老太太，正骨有绝技，于是他决定前去一探究竟。罗老太太当时已年届七十，冯天有拜她为师，开始了他自己的中西医正骨之路。很快，冯天有的医术在业内传开，因为立竿见影的医效比什么都说服力。冯天有的正骨疗法被命名为“新医正骨疗法”，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冯氏正骨迅速在军内推广，他也就得到机会调入空军总医院。

后来的日子里，邓小平及夫人、李先念副总理等领导都找冯天有看过腰痛，都得到了很好的疗效。1977年，邓小平将冯天有（合影见图）推荐给金日成治腰痛，结果金日成多年的腰痛好了。金日成还赠了吃的东西及礼物给冯天有。那时出国都代表国家，个人收的礼物回来时上交组织了，留下了一些水果带回家。有一件重要的礼物，经组织讨论，给冯天有大夫留下了，是一块手表。冯叔叔拿给我看过，在瑞士定做，上面有朝鲜文写的金日成三字。由于这礼物太贵重，组织上考虑下次冯大夫去看病时金日成可能问起，决定将表留给个人，并叮嘱见金日成时一定要戴上。

冯叔叔随着名气增大，工作特别忙，后来又搬家走了，职务上也升为空军总医院副院长，授以少将军衔。我再见他常常是我回家看望老妈，在花园里看见他们夫妻俩饭后散步。



[美]穆哈迈德·阿里·哈利德著 陈丽蓉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

《巴勒斯坦人的故事：流亡者的悲情、绝望与抗争》选载之四·至此结束

矛盾的巴勒斯坦人

在认识到已不可能回归到巴勒斯坦的事实之后，爷爷用父亲在海湾工作期间赚回来的钱在两个难民营之间购买了一小块地，在上面建了一幢两层楼的房子。自从黎巴嫩发生了巴勒斯坦人的流血事件后，这座房子就成为来自各个派系、民兵和团体的人的庇护所。

母亲是第一个看到那栋新房子的人。她说当她走进去时，几乎晕倒了。对此，我能够想象得到，她当时是多么的沮丧和失落，尤其是当她想到我们在海湾安稳的生活被一群贪婪的士兵和那些掠夺我们财产的人摧毁时。爷爷把房子登记在他的名字之下，然而，在拉菲克·哈里里任黎巴嫩总理期间，黎巴嫩议会通过了一项财产法，禁止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购买和拥有私人土地，因此爷爷去世后，他的子女们无法继承房产或将房子登记在他们的名下。

悬在半空中的自己

读完初中后，我进入塞达市的女子公立高中就读。高二时，我和我的黎巴嫩同学共同获得优秀学习奖。但我从未明白，明明只有我才真正有资格获得这个奖，为什么要让我和

那位同学共享这一奖项。

由于身份问题，我经常感到自己悬在半空中。我从未理解在大学里加入巴勒斯坦学生协会、加入某个组织、参加抗议游行或效忠于某个领袖的价值在哪里。也许在我看来，对巴勒斯坦的归属感只是一种私人的情感，是一件私事。我对家乡的热爱和我向真主祈祷的方式很像。如果可能的话，我甚至会把那种热爱隐藏起来，只在心里默念。但是我一直有一种无法解释的疏离感和不安定的孤独感，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的一生。

即使我大学毕业并在近东救济工程处援建的学校获得一份工作，情况也没有发生改变。这个机构的存在让我感到羞耻，我有这种想法，既是我的优越感使然，也是因为我浓厚的爱国情怀。或者，这也许是因为我一边不敢承认巴勒斯坦无能、贫困和分裂的事实，另一边却又对这份工作高度依赖，极度需要那充分暴露我们一无所有和揭露世界丑陋面目的一袋面粉或一条毯子。但正是这种对贫困的恐惧，我接受了一份在这个机构当代课老师的工作，即使这个机构从剥削和贫乏的视角来看待我们。

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

奶奶过去常常唱歌，她会对着枕头、对着大海、对着长长的道路、对着被遗忘的打谷场、对着指甲花和婚礼等一切事物歌唱。但我从没有意识到，她唱的一切都与巴勒斯坦有关。

也许是她流利的歌声和无声的泪水教会了我克制，也许是她那温柔的声音带我看到了我的家乡，也许是她给了我一个矛盾的巴勒斯坦人形象：既是温和的，又是被诅咒的。的确，我指责巴勒斯坦人自己参与了占领活动。如果他们不把巴勒斯坦留给以色列人就好了，如果他们投降，我们就不会被迫迁徙。我们为流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的尊严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不断的妥协逐渐丧失。我们曾经不顾一切地试图确保自己的生存，却没有意识到让步、背叛和背信弃义的严重性。这些行为不断地、循环往复地让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蒙受羞辱。

当我在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时，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一个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被认为是一个不值得活下去的人。这使得巴勒斯坦人不得不像信徒那样向近东救济工程处

祈祷。而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只是近东救济工程处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服务。

在那里工作时，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想法——巴勒斯坦人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他们有心理疾病，情感上吝啬不堪。我把这归结于折磨我们的集体意识并蔓延到我们文化中的恐怖心理。吝啬是贫困和害怕匮乏的结果，而守财奴首先是在感情和情绪上吝啬。

近东救济工程处援建的学校是让我得以了解孩子们内心世界的地方，让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尽管我对在学校的日常生活感到愤怒，但这也让我学会对巴勒斯坦社会中那些会让人愤怒和痛苦的一切，报以同情和感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归属感是有问题的，它带来的是致命的冲突、排斥和抵制。巴勒斯坦派系林立，领导人被追捧，我们的家园在充满伪装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中逐渐消失。

我真的觉得巴勒斯坦人用他们自己的悲惨处境给世界带来了负担，这种悲惨处境有时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有时不是。当我看到我周围的同事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钱和政治派系的时候，当我发现巴勒斯坦作为一个国家却在他们的谈话中完全缺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起义的真正对象应该是我们自己——我们应该针对自己，反思自己。